举报用人腐败 60.8%受访者首选12380平台

96.4%受访者感觉身边违规任用干部情况较多

CFP供图

本报记者 孙 震
实 习 生 倘凌越 孙 峰

随着中央加大反腐力度，今年以来一批大小腐败官员接连落马，民众举报在其中功不可没。近日，针对干部选用过程的违规行为，中组部正式开通了“12380”短信举报平台，和先前的举报信件、电话和网站一起组成了多渠道的举报受理平台。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手机腾讯网进行的一项调查（36520人参与）显示，如果举报用人腐败，60.8%受访者首选给“12380”打电话或发短信。对于举报后的期待，受访者最希望能“保护隐私”，其次是“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

“12380”的开通给所有官员敲响了警钟

调查发现，虽然87.7%的受访者在此次调查前不知道中组部开通了“12380”短信平台，但是如果之后自己去举报用人腐败，60.8%受访者倾向于给“12380”打电话或发短信。其他举报方式有：打其他举报电话、发短信（7.3%）；到中组部、纪委网站留言（7.1%）；通过微博举报（5.1%）；亲自到纪检部门举报（3.2%）等。

听闻“12380”四位一体平台开通，上海市某机关工作人员孙欣（化名）觉得这是政府希望民众参与反腐工作的诚意表现。有人很可能知道跑官卖官的真相，想通过举报监督官员行为，畅通的渠道很有必要。孙欣表示，微博上那些爆料真真假假难以令人信服，以往的检举方式诸如写举报信、打举报电话风险又太高，直通中组部的热线会让人觉得放心许多。

“开通一个平台会真的管用吗？”家在河南的周然（化名）是一名社工，他记得老家有人因拆迁一事向上信访，闹了好几年也没结果。“信访制度这么多年了，本人亲自去举报都很难有效果，现在一个电话一条短信就能成了？”在周然看来，举报通道的多元化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举报之后得“有个说法”。

湖北武汉黄陂区交通协警张余明（化名）觉得“跑官买官”虽然是少数人的行为，但“12380”的开通在很大意义上给所有官员敲响了警钟，让他们约束自己的行为。“今年以来政府的反腐工作十分鼓舞人心。但光抓大官是不够的，基层是政令最容易走形的地方。民众想解决身边事的愿望很迫切，希望‘12380’有用。”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认为，以往民众对组织人事上的不正之风多是向纪委系统举报，很少直接向组织部门反映。组织系统开通这样一个平台，对于推进人事方面的反腐败工作有很积极的意义。具体表现在，一是能够通过广泛地搜集民意，既能发挥民众的智慧参与反腐，也能让主管部门掌握更多的违规信息；二是这样的举报机制，在整个组织的管理系统上会对官员的任用起到威慑作用。

96.4%受访者感觉身边违规任用干部情况较多

调查发现，96.4%的受访者感觉身边“跑官买官”等违规任用干部的情况较多，但仅有13.2%的受访者会举报。

江苏徐州的陈鹏（化名）夫妇经营着一家熟食店，“做生意太难，不仅需要有经济头脑、资金支持，更要摸清官员的‘门朝哪里开’。”他坦言当时为了营业执照的批准、卫生条件的认定和店铺租用等环节顺利“通关”，也靠送礼来处理好和一些官员的关系。他发现“很多官员业务不熟、素质不高，让人不禁怀疑他们是怎么上去的？”

陈鹏平时喜欢上网，他在微博上见证了网友举报“表哥”、“房叔”的过程。他觉得今年以来反腐的效果尤为显著，“这是鼓励老百姓参与的结果，普通人也更愿意通过网络来提供线索。”

张余明几年前就听说过12380的电话平台，“但如果和自己的利益牵连不大，普通人很可能不会举报，怕得罪人。但正是这种沉默才助长了违规选用官员的不良风气。”

周然对举报之后个人真实信息的保护也有担心。“有时地方上的事老百姓知道得最清楚，但不敢举报，就怕‘秋后算账’。”周然认为，“12380”平台要想让大家敢积极主动地监督，就得在保护举报人上下功夫。“如果大家都参与进来，那些动歪脑筋的官员怎么也得收敛一点吧？”

庄德水表示，举报在职领导需要实名的规定，影响了很多人的意见表达。有一个能够保护举报人利益的平台十分重要。由于所有案件的线索最终归纪委系统处理，为了更好地发挥作用，一方面，“12380”应该进一步向民众解释平台的功能和职能定位，不要跟纪委系统的平台混淆。另一方面，应该加强对这一平台的宣传，以吸引更多社会公众向组织部门反映意见，并以实际的工作绩效和诚信来赢得社会信任。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利华指出，政府如果想保持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就必须给老百姓开一个出气孔，要有反馈渠道。“12380”使得举报通道更方便和直接，基层百姓可以直接联系到中组部，省了许多中间步骤。

“政府需要开通社会向政府的输入渠道，让百姓的意见和建议快速地向政府系统输入，政府系统迅速处理，最后输出政策。当输入和输出达到平衡时，就是社会的最佳状态。”他指出，这样一个渠道的开通也需要考虑多方面的问题，比如对举报人的保护，排除造谣、诬陷举报的措施。

调查显示，对于举报官员违规任用之后的期待，受访者认为应该保护“举报人隐私和权益”（45.4%），并做到“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24.9%）和“重视民意，深入查出违规行为”（14.9%）等。

一条检举通道能否得到信任关键看处理结果

在受访者看来，“12380”平台的公布将会“促进干部自律减少腐败”（12.7%）、“督促干部选拔更公平”（5.9%）、“遏制跑官买官现象”（5.3%）、“促进全民监督官员任命”（5.2%）、“提高官员任用的公信力”（3.6%）。

在孙欣哲看来，一条检举通道能否得到信任关键看处理结果。很多官员的任命很有可能“拔出萝卜带出泥”，牵连广，案情复杂，不容易下结论，但应该尽可能地让民众知情。“可以借鉴‘快递’系统，接到举报并核实后，要首先表态‘发货了’——案件立案查处了，进展到哪一步了民众也可以追踪到，这样民众才会相信过程是公正合理的，才能真正遏制违规任用问题，在最大程度发挥民众参与的力量。”

庄德水认为，一方面，我国应该继续广开渠道来创新组织工作。另一方面，也要增强组织人事工作的公开和透明性，就是拉进组织工作和民众的距离，提高他们参与和监督的意识，才能有效保证干部选拔任用的公平和合理。

“要想鼓励更多民众参与监督，仅有一个渠道是不够的。”张利华认为，银行的评价系统值得借鉴。如果政府办公部门可以设置公共的满意度反馈系统，开放民众即时对政府打分或者每年定期打分，并将这些分数和政府的绩效、官员的提拔挂钩，甚至不需要大的行政体制改革就可能会收到明显的效果——让官员不能用、也不敢用手中的权力换取利益，民意监督的约束作用就发挥出来了。

“全民监督需要非常发达的反馈投诉系统支持，如果在这些细节方面做好，全民监督可能会胜过其他的监督形式。”张利华说。

（调查合作伙伴：手机腾讯网《立场》栏目）

手机腾讯网 3G.QQ.COM

扫二维码，参与更多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民意调查

日本人很少去大型公立医院看病

吴梦琪，北京师范大学学生

实 习 生 郑静宜
本报记者 周 易

作为世界上人均寿命最长的国家，日本的医疗技术和总体服务水平比较高。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曾在日本爱知淑德大学交换一年的大四学生吴梦琪告诉记者，日本的医疗保险全国通用，额度高达70%，而医院环境温馨，医务人员的服务意识很强。

中国青年报：日本的医保体系是怎样的？

吴梦琪：在日本，几乎每个人都加入了医疗保险，都有一张保险证。从功能上来说，就像我国的医保卡一样。但是，日本的保险证是一张很薄的纸，上面连个人照片都没有，只有名字、出生年月和保险号码。留学生去日本，要求在一个星期之内到区役所（相当于中国的区政府）进行户籍登记，登记后就到另一个窗口办理保险证。

每个人根据自己的财力，需要缴纳的保险费用不同。像我当时在日本属于零收入人群，买的就是最基本的保险，每个月交1400日元。我的同学有的半工半读，如果每个月收入在10万日元以上，就要按照收入计算一定比例的保险费用。每个月区役所都会把应付账单寄到公寓，我们直接到便利店交钱。

在日本没有所谓报销，每家医院都可以直接出示保险证付费，病人只需要承担约30%的医疗费用。而且保险证是全日本通用的。离开日本前，我去关西玩了5天，当时先去我所居住的名古屋市名东区的区役所解除户口。工作人员看了我的信息表后，确认了我还在日本停留5天，就让我先保留保险证以备万一，到期后保险会自动注销，保险证可以作为纪念带回国。

中国青年报：日本的医疗设施情况如何？

吴梦琪：日本少有大型公立医院，满大街都是私人诊所、医院，而且基本都以人名命名。私人诊所和医院的分类很细，比如我住的一带老人比较多，因此就有很多接骨医院。检查的分类也很细致，比如一个妇科诊所中，可能有的项目可以检查，有的就没有。

日本医院的营业时间很短，假期制度也和中国大不相同。我住的公寓旁边的牙科诊所周四、周五都休息，有时周日也不营业，营业的日子基本下午4点就关门，有时晚上八九点才关门。日本诊所门上会挂牌，以画圈和画叉标明营业日，而且每家休息的时间都不一样。

中国青年报：日本存在“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吗？

吴梦琪：看病很方便但需要预约。医院会把病人能约到的时间写得很清楚，现场填单子或者打电话预约都可以。不过看病时有一些项目可能稍有点贵。我的一位同学因为长智齿，去牙科诊所看病，拿回来一些止痛片，可能还有其他检查项目，自费付了4000多日元。日本最普通的药一般都在一两千日元左右，而如果自己到药妆店买药是全自费。不过，在日本，公司白领的基础工资每个月有25~30万日元左右，吃一顿稍微好一点的自助烤肉也要3600日元，因此医疗费用相对于日本国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应该还可以。

中国青年报：去公立医院看病情况怎么样？

吴梦琪：对日本人来说，私立医院、诊所和公立医院没有太大区别，而且因为私人诊所多，更方便，一般都就近就医。因此，除非有大病，否则日本人很少去大型公立医院。大型公立医院最大的优点就是全面，但是一般只有住在附近的居民才会去。因为去公立医院看病，要排很久的队，或者提前预约。我去过一次校医院，进去看了一下，发现人很多，因为赶着上课就匆匆离开了，后来去了私人的眼科医院。

中国青年报：日本医院的环境如何？

吴梦琪：像校医院这样的公立医院，会选用暖色系的布置。地板铺用米色瓷砖，护士着装是浅粉色的，灯光偏黄，让人感觉整体环境很温馨。私人诊所则将环境布置得比较居家。我之前去牙科诊所看病，发现整个室内都铺了木地板，进去要换上诊所的拖鞋。在前台等候时，有沙发、饮用水、小糖果和杂志。空间不大，前台等候的房间就占据了诊所三分之一的空间，诊室也只有两三个。不过诊所看病的人很少，不用等太久。

中国青年报：日本医生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态度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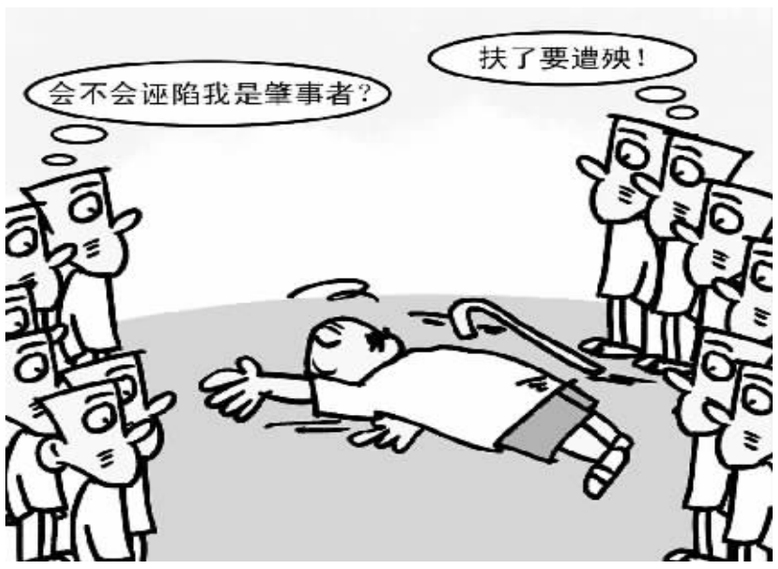
吴梦琪：他们的服务质量无可挑剔，医疗行业和其他服务行业一样，都是使用敬语，永远都不会催促客户。医生态度也很好，说话特别温柔耐心。日本的医生社会地位很高。在日本，“先生”两个字，只用在医生、老师和律师这三类从业者。日本可能也存在一些医疗纠纷，不过比较少，新闻里也很少见医疗方面的问题。

中国青年看世界

遇老人倒地，为何55.6%受访者选择直接走开——

84.9%公众坦言扶不扶老人很纠结

如果遇到老人倒地，公众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在有139010人自发参与的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这项调查中，55.6%的人选择直接走开，23.4%的人选择留下证据或找到证人后再扶，12.6%的人选择拨打110并等待，仅有5.4%的人选择毫不犹豫主动扶起来。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伦理学研究室主任卞绍斌直言，当人们开始思考老人摔倒要不要扶的问题时，就表明社会道德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问题。



CFP供图

实 习 生 倘凌越
本报记者 向 楠

遇到老人倒地扶不扶？这个问题近年来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关注与讨论，不少人在说出“会扶”这个答案时变得犹豫不决。近日，“四川达州3名儿童搀扶倒地老太被讹”、“浙江金华八旬老人倒地五六分钟市民不敢扶”、“北京老外撞人却误传倒地老人讹诈”等一连串事件，让公众的关注与讨论推向新的高度。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手机腾讯网对139010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80.4%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在持续关注与扶老人有关的新闻，20.2%的受访者承认在自己身边有过老人倒地而得不到帮助的事情发生。87.4%的受访者表示“扶老人”的道德焦虑在当前社会普遍存在，84.9%的受访者坦言自己就存在“扶老人”的道德焦虑，扶不扶老人很纠结。

遇老人倒地 为何55.6%受访者选择直接走开

如果遇到老人倒地，公众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在有139010人自发参与的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这项调查中，55.6%的人选择直接走开，23.4%的人选择留下证据或找到证人后再扶，12.6%的人选择拨打110并等待，仅有5.4%的人选择毫不犹豫主动扶起来。

“可能会装作没看见走过去吧。”当被问及遇到老人倒地后会怎么办时，家住天津的赵泉想了一会儿后这样说。他直言，现在“碰瓷”的人太多了，如果倒霉碰上了，钱是小事，关键是心里憋屈。就算不是“碰瓷”的，好人做到底，打了120肯定得跟着把老人送到医院，医疗费也得自己垫，万一遇见的是孤寡老人更是摊上一堆事。“不是不想扶，真的是扶不起。”

对于同样的问题，北京某互联网公司职员罗君的回答则不同。他表示，虽说大城市人际关系比较淡漠，但是出来打拼久了，看身边的老人总能想到父母，如果遇见有老人摔倒，自己会去关心一下。“父母在家乡年事渐高，也有可能遇到这种情况，我希望在他们摔倒时有人关心，其他老人的子女肯定也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得到帮助。”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伦理学研究室主任卞绍斌直言，当人们开始思考老人摔倒要不要扶的问题时，就表明社会道德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问题。因为一个有价值的道德行为应该是出于良知和义务的意图，应该是不计得失、不求回报，甚至是面临艰难、痛苦和困境依然执着以求的，当帮助他人需要计算成本利益，考虑利害得失时，严格来说不能称之为道德。

“如此久而久之，纯然的良知将被蒙蔽，道德原则将主要受制于功利的考量，人们将不再相信道德法则，最终是道德感的丧失、道德法则的瓦解和人际关系的冷漠。”卞绍斌说。

复旦大学哲学系讲师郁▮隽表示，现在大家是有心做好事却担心惹事，长此以往，人际间会慢慢形成一种冷漠，许多社会成员会有对整个社会的一种失望感，同时每个人也会对自己有一种暗示，认为自己发生什么事情也不会得到别人的帮助。

87.4%受访者表示当前普遍存在“扶老人”的道德焦虑

“虽然基本的道德准则告诉我，遇到老人摔倒当然应该主动扶起来，但是在如此多的信息轰炸之下，我难免对自己的坚持有些疑惑。”罗君坦言，在遇到老人倒地扶不扶的问题上，他有着道德上的焦虑——不扶自己良心上过不去，扶又怕被讹。这个问题有时会让他非常纠结。

“如果带女儿出门碰见老人摔倒的情况，我就真的傻眼了。”赵泉的女儿今年4岁，在幼儿园里老师会教小朋友乐于助人、尊老爱幼，书里画的也都是小朋友扶老爷爷老奶奶过马路。遇见摔倒的老人，如果不扶，怎么对女儿解释呢？如果扶了，碰上讹人的给女儿造成心理阴影怎么办？“真希望我永远不要碰到这样的问题。”

对于普通老人而言，大家在扶老人问题上的道德焦虑也渐渐影响了他们的生活。“说实话我真不相信有这样的老人存在。”北京某中学退休教师刘齐（化名）一直弄不懂那些讹人的老人是怎么想的，“究竟能为了多少钱把老脸都丢了？是因为没有保险？或者子女对他不好？”

刘齐直言，讹人的老人毕竟是少数，媒体不能净捡着负面的个案去写，弄的老人好像都是为老不尊、倚老卖老似的。大家不能因为个别极端的事件，就对整个老人群体产生误解。“前两天我还和儿子讨论这件事，我告诉他，如果我摔倒了，我首先就会大喊‘我是自己摔倒的’。”

调查显示，87.4%的受访者表示“扶老人”的道德焦虑在当前社会普遍存在，84.9%的受访者坦言自己就存在“扶老人”的道德焦虑。

“‘扶老人’的道德焦虑是整个社会信任缺失的表现。”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郑路直言，这种普遍存在的焦虑，反映出的是社会人际关系的恶化与社会信任纽带的断裂，这会给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以及整个社会的运行带来巨大成本。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我国老年人的医疗保险可报销的比例非常低，老人如果摔伤可能对于他本人和家人都是很重的经济负担，甚至可能担心子女埋怨自己。如果医疗保障能够减轻老人这一负担，他们也就没有必要找人转移责任，这是一个制度的问题。”郑路说。

郁▮隽表示，在年轻人扶老人的案例中，如果判决不当可能会造成代际之间的矛盾。本来社会中的人是一种共生、共存关系，这样的案例如果越来越多，人们会越来越偏向于变成一种原始的孤立的个人，就好像人只能依靠自己，严重的还会出现反社会的行为。“应该重视这些案例对年轻人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果真的这样下去，几十年之后，可能就没有人再相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这种传统的道德追求了。”

59.5%受访者认为恶意讹诈他人的老人应受惩罚

如何才能化解普遍存在“扶老人”的道德焦虑？受访者首选“恶意讹诈他人的老人应受惩罚”（59.5%），其次是“目击者要勇敢讲出真相”（15.1%），排名第三的是“司法判决应注重对社会的引导”（7.2%）。接下来是：媒体不能只渲染部分极端个案（5.7%）、相关部门要给人可信服的真相（5.2%）、在社会上倡导勿以恶小而为之（3.1%）等。

郁▮隽表示，当大家都在谈论扶老人事件，说明大家都还很关注这些事件及其背后的问题。如果当大家对这种事情冷漠对待、认为理所应当时才是最糟糕的。“常言道人言可畏，如果讹了别人，以后便再无人相信你，会遭到周围人的排斥，这本身就是做坏事的一个后果。从制度层面而言，如果讹人的人受到法律的严惩，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此类事件的发生。”

卞绍斌表示，法律法规是外在的，道德良知和道德信念才是左右个人行为、构建良序社会道德法则的根本源泉。当下应当改变那种灌输式、教条式的道德教育模式，着重培育基于道德自律的实践理性能力，特别是出于良知和义务的道德自觉能力。

“要弥补社会信任纽带的断裂，化解焦虑，制度保障是必须的。”郑路建议，一些公益慈善组织可以设立基金会，专门针对扶老人被讹的情况，提供法律援助和资金支持，从而减轻大家的顾虑，降低风险成本。“虽然大家在讨论这一问题时表现出了一定的担心与焦虑，但我相信，如果真的遇见类似情况，大多数人还是会伸出援手。”

调查中，28.1%的受访者认同，虽然扶老人事件被吵得沸沸扬扬，但是日常生活中遇到老人倒地，冷眼旁观的人是少数，大多数人都还是会伸出援手。

92.1%受访者关注2014年如何放假

67.5%受访者建议延长春节假期

本报记者 周 易
实 习 生 王梦莹

近日，全国假日办结束了关于2014年节假日调休安排的网络调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搜狐新闻客户端对3204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92.1%的受访者关注假日办2014年节假日调休安排方案。60.2%的受访者对三套方案都不支持，32.1%的受访者支持保留春节和国庆两个7天长假的第三套方案，支持另外两套方案的受访者合计占7.7%。

家住杭州的吴女士认为，假日调休安排征求民意是一个进步举措，值得肯定。不过，对于公布的方案，她感到不太满意：“企盼已久的五一黄金周还没恢复，春节也没有延长。总体来看，只是变了变调休方式，以往假期安排的种种弊端没有得到很大改善。”

调查显示，57.3%的受访者认为当前法定假日天数少，40.3%的受访者反映假期太短，59.6%的受访者不满挪假的休假安排，23.2%的受访者不满假期不能自主调节。

从本次公布的方案可以看出，假日办已经关注挪假、假期碎片化带来的种种问题。不过，为了在不改变假期天数的前提下保证长假，挪假依然不可避免。

郑州某公立医院医生张蓝天（化名）很不赞成挪假：“我曾经连着上班14天没有休息，这种状态下怎么好好给病人看病？挪假只会让病人更集中，医生更辛苦。”

正在读高中的高航表示，虽然通过挪假拼凑成的长假很有诱惑力，但挪假不是明智之举：“长假前的那一周确实心情不错，但学习效果很不好，尤其是周末连着上课时，几乎听不进去，老师讲课也没那么上心了，有的课干脆会放电影让我们放松一下。”

调查显示，55.1%的受访者赞成取消挪假，以避免连续工作日变长；23.3%的受访者不赞成取消挪假，担心假日成了“单蹦”；21.6%的受访者回答不好说。

中国闲暇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魏翔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综观其他国家的做法，基本都是“少挪”或“不挪”。“原来日本挪得也比较多，但后来研究显示，国家如果在宏观层面挪动比较多，就会对人的经济行为、身体状况和交通状况产生很大影响，比如假日综合症。”

其实，法定假日并不是我国劳动者可以享受的唯一假期。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已经从法律层面明确规定职工享有带薪年休假的权利。可是为什么人们对于法定假日特别关注？调查显示，可以和家人同时休息（68.7%）、带薪休假落实情况差（43.8%）、法定假日具有强制性（37.4%）是受访者寄希望于法定假日的三大主要原因。其他原因还包括适逢各种节日（19.7%）和娱乐项目多（6.9%）。

刚到外企工作两年的徐晓琳告诉记者，她从未享受过带薪休假：“虽然公司有带薪休假的规定，老员工会休一些，我们刚来的哪儿敢？平时生病了也尽量不请假，能撑着就撑着。”在她看来，带薪休假是事业单位人员和公务员才能享受到的福利。

作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带薪休假的问题上，张蓝天也遇到了困难：“说起来每年是有15天的公休假，但同事协调起来很麻烦。我们科室好几个大夫的孩子都上大学了，都攒着假期想等孩子放假回来了再休息。到时候让谁休息不让谁休息呢？每年都会因为这个闹点不愉快。”

上海律协劳动关系研究委员会委员温陈静表示，当前中小型私营企业在国内占主流地位，因为不愿增加用工成本，一般不主动提出让员工休年休假。而员工由于害怕影响自身发展，也不敢向企业提出休假要求。

魏翔指出，由于我国正在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劳动力成本升高，实行带薪休假才刚刚迎来契机，落实还需一个渐进的过程。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员工的休假相对比较充分。而容纳大量劳动力的中小企业，员工的休假权很难得到保障，得到的政策支持很少。

他认为，要改变目前放假方面出现的种种状况，一是继续强制落实带薪休假，二是可以通过转移支付来鼓励企业给员工放假。“比如，企业给员工放假，国家就折算成企业的减免税。”

怎样放假更让人们满意？调查中，67.5%的受访者建议延长春节假期，62.3%的受访者希望保留五一、国庆和春节长假，45.3%的受访者提议增加法定假日天数，38.0%的受访者企盼落实带薪休假，33.6%的受访者提议每个季度都设一个长假，30.3%的受访者建议增加传统节假日，17.3%的受访者希望自主决定假日与周末的搭配。